

经典翻译与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

许 宏^{**}

摘 要：经典翻译在巴哈伊教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宗教经典翻译对宗教传播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等问题。当代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宗教经典翻译不断地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宗教术语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适时地调整或改变，这正是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宗教在中国土壤中能否生存的关键。

关键词：宗教传播 本土文化 本土化

对于任何宗教而言，经典翻译在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巴哈伊教也是如此。当代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其宗教经典翻译不断地与中国文化相适应，宗教术语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适时地调整或改变，这正是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过程，也是每一个宗教在中国土壤中能否生存的关键。本文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了巴哈伊教经典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巴哈伊教的经典翻译与中国文化、经典翻译对巴哈伊教传播的影响三个方面的内容。

* 本文是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国家安全视野下新兴宗教在我国的传播、影响及对策研究》（12YJC730011）的阶段成果。

** 许宏，哲学博士，德州学院社科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宗教哲学。

一 巴哈伊教经典著作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其一是信仰的早期阶段巴哈伊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其二是巴哈伊教传入中国后的现状及其经典的翻译。

（一）早期巴哈伊教经典的翻译与传播

出于宗教传播的角度考虑，巴哈伊教的中心人物之一守基·阿芬第在信仰的早期就注重经典的翻译。他翻译的各种经典著作，对于巴哈伊教在世界的传播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守基·阿芬第是阿博都-巴哈在遗嘱中指定的“圣作”之唯一、权威的阐释者，出于这一职责，他进行了大量的巴哈伊教英文翻译，以把巴哈伊教教义弘扬于世。其次，由于巴哈伊教原典大多数是波斯文或阿拉伯文，世界各地的人们阅读起来有很大困难，从而也无法理解巴哈伊教义。再次，波斯文的语句结构较为松散，很多时候容易在读者的头脑中产生歧义，而细致准确的英语就不会产生歧义。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巴哈伊教，守基·阿芬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翻译这些经典著作。由于他对巴哈伊教的深刻理解，因而他对巴哈伊经典的翻译做到了信、达、雅。正如《无价珍珠》一书中讲到的：“当它^①与守基·阿芬第卓越的心智和阐释圣言的能力结合后，便成了一种精准的传达教义的工具。在参考了守基·阿芬第的英文翻译后，我们往往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巴布、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原意，将来也不会有所误读。他在翻译时一丝不苟，确保所用英语能完美表达原有思想或原文词意，而没有任何偏差。唯有对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较为精通的人才能充分理解他所做的工作。”^②因此，守基·阿芬第对巴哈伊经典的翻译不仅反映了他对英语的卓越驾驭，而且也是他对经典的权威诠释。

守基·阿芬第在巴哈伊教经典的翻译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指导，他确立的英文翻译标准，是要找到一种英文文体，能够忠实地传达出巴哈欧拉的

① 这里指巴哈伊经典著作，本文作者注。

② 鲁希伊·拉巴尼：《无价珍珠》（未刊出），第206页。

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崇高而感人的文风。最后他选择了略带古风的英文文本，带有詹姆士王版《圣经》的余韵。在将巴哈伊经典著作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诞生了一种新的风格，在现代英语和巴哈欧拉的原著的波斯文或阿拉伯文风格之间架起了桥梁。^①“守基·阿芬第为巴哈伊著作的翻译，特别是他自己的写作设定了一套标准，这种标准教育了读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也用思想和真理滋养了他们的心智。”^②

守基·阿芬第一生致力于翻译巴哈欧拉、巴布和阿博都-巴哈的圣言以及纳比尔手记，亲自写作过去百年的历史，推动巴哈伊教在世界的传播。他的第一部主要翻译著作是1930年巴哈欧拉的《毅刚经》（Kitáb-i-íqán）或《确信之道》。同一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本译作——纳比尔所编纂的原文为波斯文的《破晓群英传》，译作于1932年出版。这本书可以被看做是英语文学中长篇叙事作品的经典。1935年，守基·阿芬第在西方出版了一部题为《巴哈欧拉文萃》的译作，随后的1936~1937年，他又翻译了《巴哈欧拉论祈祷和沉思》这本书，堪称《巴哈欧拉文萃》的姊妹篇，其内容同样丰富，而且还加入了新的资料。1939~1940年的冬天，他完成了他的第五本也是最后一本巴哈欧拉的《致狼子书简》的翻译工作。守基·阿芬第所著的作品只有一部，即1944年出版的《神临记》，其他作品都是不同性质的公开信，如写于1941年的《允诺之日来临》也不过是一部136页的书信集。

以后的13年里，守基·阿芬第既没有翻译，也没有著书，大量的教务工作使他再也没有时间来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从1921年开始，他苦心经营的巴哈伊国际社团蓬勃发展，占尽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令他无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上天在这方面赐予了他极高的天赋，不过他还是通过信函，尤其是长篇电报给信徒和各国的机构提供指导。1941年，守基·阿芬第已经开始历数巴哈伊在全世界所取得的胜利，这种信息最终变成了振奋人心的里兹万文告，它们记述着每年的成就，让信徒能够把每个国家的工作放在一幅更大的图景之下。^③

① 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450页。

② 鲁希伊·拉巴尼：《无价珍珠》，第201页。

③ 鲁希伊·拉巴尼：《无价珍珠》，第231页。

后来巴哈欧拉的著作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翻译成了很多种语言版本，对传播巴哈伊教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不过，这些不是在原版的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基础上，而是在守基·阿芬第译著的基础上翻译出来的。正是守基·阿芬第对巴哈伊教经典的翻译，使巴哈伊信仰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他的这一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二）巴哈伊教传入中国后的现状及其经典的翻译

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就有巴哈伊信徒生活的记载了，根据巴哈伊教义的理解，有了巴哈伊教徒也就开始了巴哈伊信仰的传播。

1862 ~ 1868 年，一个来自伊朗的商人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据说他是巴布的表亲）在上海居住，后移居中国香港，这是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最早记录。1879 年，他的弟弟哈吉·米尔扎·布祖尔格也到中国香港经商。1881 ~ 1882 年，巴布妻子的侄儿阿加·米尔扎·易卜拉欣也曾在中国香港居住过。1888 年有两个巴哈伊信徒到过西藏。20 世纪初，陆续有一些伊朗的巴哈伊信徒到中国旅行或经商。查尔斯·雷米（Charles Mason Remey）和霍华德·斯特鲁文（Howard Struven）于 1910 年到上海。在非战争年代，大量巴哈伊信徒来到中国。一些信徒与当地居民会面或为那些感兴趣的人演说而作短暂停留；另外一些信徒长期逗留中国，游历各城市，接受访问，并与当地知名人士会晤。对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起过突出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玛莎·鲁特（Martha Root）的美国人，她曾四次来到中国（1915 年、1923 ~ 1924 年、1930 年、1937 年）。其中第二次逗留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间有七个多月是在北京居住的，其余时间她在中国沿海和内地作了广泛的旅行，在近百所各类学校发表演讲，举办讲座，足迹遍至天津、济南、曲阜、徐州、南京、烟台、上海、杭州、苏州、武汉等地。玛莎·鲁特交游甚广，结识诸多政府高层官员、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黎元洪总统的顾问。此外，他还多次与中国知名人士会晤，包括孙中山先生等。她还在一些中国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并将其中一些用中英文汇编出版。

最早的中国巴哈伊社区是由一些国外的巴哈伊拓荒者在上海建立的。1928 年，巴哈伊的第一届灵理会在上海成立。同期，一些小的社区也相继在北京、广州以及哈尔滨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沟通困难，守

基·阿芬第与中国内地的巴哈伊仍然有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外国巴哈伊离开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后新的社区成立：1953 年在中国澳门以及 1959 年在海南岛。1956 年，中国台湾第一个巴哈伊地方分会在台南成立。1967 年，巴哈伊教台湾总会成立。中国香港的巴哈伊活动一直没有间断过。绝大多数访华或在华居住的巴哈伊信徒都到过香港，带动了巴哈伊在那里的发展。1956 年，香港的巴哈伊成立了第一个地方灵理会。1974 年，巴哈伊教香港总会诞生。澳门也紧跟香港的步伐，在 1958 年成立了第一个地方分会，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也于 1989 年成立。

初期的巴哈伊信仰在中国影响并不大，只有少数的外籍巴哈伊信徒活动，也没有进行翻译出版方面的工作。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一些社会名流、政府高层官员及知识分子对巴哈伊信仰产生了兴趣并高度关注，这时便开始了巴哈伊教经典的翻译，有了汉语出版物。1921 年，最早的中文巴哈伊文献在上海印制，有一家名为大同教社的出版社，系统出版巴哈伊信仰的相关书籍，这是最早的巴哈伊信仰出版社。一些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中国人接触到巴哈伊信仰，回国后开始信仰的传播，并翻译了巴哈伊方面的著作，如廖崇真、曹云祥等人。廖崇真在美国读书时接受了巴哈伊信仰，1923 年回国担任中山大学农业学院院长，后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他将巴哈欧拉的《隐言经》《世界书简》《塔拉扎特》和《伊什拉卡特》等著作的英文本译成中文。这是所见到的最早的巴哈伊中文书籍。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 1924 年接受巴哈伊信仰，他成为巴哈伊信徒后，把巴哈伊思想贯彻到建设清华大学的实践之中，还不遗余力地在中国推广巴哈伊教的教义，撰写并翻译了许多巴哈伊相关的文献，介绍巴哈伊信仰，影响了许多中国人。曹云祥先生在巴哈伊教经典翻译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把英文版的《巴哈欧拉与新纪元》《亚卜图博爱之箴言》《世界之趋势》《至大之和平》《已答之问题》《巴海的天启》《大同教之人心的改造》等翻译成中文，这些对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巴哈伊信仰在中国的传播较快。宗教的传播离不开文字的传播，离不开出版物的发行。因而，巴哈伊在中国的影响与巴哈伊经典译著等出版物的出版、巴哈伊研究成果的发行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对巴哈伊教的研究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根据 2011 年《中国宗教报告》有关中国人对巴哈伊教的研究状况来看,巴哈伊教在大陆的研究包括研究中心的数量和人员数量,研究成果都体现了未来的国家对未来的宗教的研究热情。^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广州大学巴哈伊研究中心等都在不同层面展开了研究或翻译工作,并组织召开了多次巴哈伊教研讨会等,这些都扩大了巴哈伊教在中国的影响;当然,许多的巴哈伊网站、巴哈伊国际学术机构给学者研究巴哈伊教提供了有价值的英文资料外,新纪元国际出版社自成立以来,翻译并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巴哈伊教典籍,给大陆学者研究巴哈伊教提供了方便,节省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的确,出版物的推广、发行也让更多的中国人认识并了解了巴哈伊教。

二 巴哈伊教的经典翻译与中国文化

宗教经典翻译应注意与本土文化融合。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外来宗教往往很注意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问题。外来宗教在异质文化土壤中生存和发展,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现象。当外来宗教进入本土后,不可能立刻或全部被接受,它必然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特别是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宗教经典的翻译以及面对不同受众时需要做适时的变通与改变,是每一宗教都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其传播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处。宗教经典的翻译,不仅意味着一种语言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也意味着一种文化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而这实际上就是外来宗教本土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宗教的传播与经典的翻译很多情况是同时出现的。如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其经典的翻译工作几乎同步开始。虽然 19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就有了外国巴哈伊信徒,但真正开始在中国传播大约是在 20 世纪初。“1914 年真正有组织的巴哈伊传教活动在上海开始”^②,“1917 年 11

① 金泽、邱永辉主编《中国宗教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 14 页。

② 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 573 页。

名波斯巴哈伊信徒一起来到上海，成为有历史记载的来华最集中的一次巴哈伊传教活动”^①。早在民国时期，伴随着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的巴哈伊翻译工作逐渐开始了。1935年，曹云祥开始翻译巴哈伊教经典，他认为巴哈伊教的主张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世界大同”理想相通，如孔子的大同理想，集中反映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再如康有为曾写过《大同书》，也描述过天下大同的理想；孙中山提出过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经常题写的词句，而他对黄埔军官学校的训词则是：“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由此可见，在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是紧密联系的，等等。曹云祥则看到了中国的大同思想与巴哈伊大同的相似性，故此将其翻译为“大同教”。但是，后来学者们发现，使用大同教虽然通俗易懂，然而与以前在国内外使用过的名称重复，容易误解。例如中国古代有些民间宗教称为大同教的说法。所以后来学者们不再用大同教这一名称。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1年大同教正式更名为“巴哈伊教”。可见“巴哈伊教”的名称已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成分。

对关键人物的译名，要结合中国文化。例如“The Bab”的译名问题，近年来，中国港澳台出版的巴哈伊教方面的宗教书籍大多翻译成巴孛；而大陆出版各类历史、宗教书籍、词典则是以“巴布”的译名出现的。关于巴布其人，因世界历史上“巴布运动”的领袖而早就被中国人广为知晓。巴布所领导的伊朗巴布运动与爪哇人民反对荷兰统治者的起义，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军的起义，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印度民族大起义一起被称为亚洲革命的风暴，被列入中学教科书里。从中学时代起，巴布这一名字就印在人们心里。所以，大多数人了解巴哈伊教之前，心目中早就有了巴布这一形象存在。如果翻译过程中不考虑这些，仅仅从读音上把“The Bab”

^① 蔡德贵：《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第574页。

翻译成巴孛、巴卜或其他什么译名，人们会认为和原来心目中的巴布不是同一个人，将会带来很多问题。而使用巴布这一译名，人们自然而然通过对巴布有关资料的了解，而渐渐认识了巴哈欧拉，认识了巴哈伊教。

巴哈伊经典的翻译要符合汉语习惯，朗朗上口。特别是早期的一些翻译过来的中文巴哈伊资料，有些译文显得比较生硬，甚至不对照英文很难理解其中的意思，这往往会给读者带来很大问题。“圣护在翻译或写作时，方法既新颖又有趣。他写作的时候会大声念出来，一边念一边写，我想这种英语写作的习惯是从波斯语来的，优美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作品不仅可以吟唱，而且也应该吟唱。有人记得巴布在启示《卡雍慕拉斯玛》(Qayyúmu, l-Asmá) 时，就是将它读了出来，巴哈欧拉也是这样启示书简的，这就是圣护使用英语和波斯语时的习惯，而且我相信正因如此，他那长而复杂的句子一经朗读，听上去就更加流畅易懂。”^① 当然宗教经典翻译的本土化需要一个过程，也会遇到很多挑战或困难，这需要在翻译中不断探索。

三 经典翻译对巴哈伊教传播的影响

任何一个宗教要想在一个新的土壤中生存，人们首先需要了解该宗教的教义，阅读其宗教经典。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它的传播必然是以教义的传播为中心，而教义的传播则要以经典的传译为前提。巴哈伊经典翻译的发展推动了巴哈伊教在中国的传播。当然，翻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即宗教经典的翻译是巴哈伊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手段。

巴哈伊教有独特的教义，尽管它没有神父、阿訇、牧师等专门传播、讲道的宗教神职人员，但每一位普通信徒都有弘扬教义的义务。所以，每一位信徒都要通过认真阅读该宗教的经典、了解巴哈伊教的教义，独立探求真理，逐渐把巴哈伊教所倡导的教义传播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接受。据调查，许多人是通过自己独立阅读巴哈伊教经典而不是通过他人传教的方式皈依该信仰，成为一名巴哈伊信徒的。人们接触巴哈伊教

^① 鲁希伊·拉巴尼：《无价珍珠》，第202页。

时，往往是通过相关的宗教书籍、宗教网站了解该信仰。当然巴哈伊全球推广的“儒禧”课程的学习也是该宗教重要的传教方式。在笔者接触的初学者中，发现他们一开始往往会怀着一种批判或质疑的态度来看待。最后却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巴哈伊信徒，笃信其教义往往是通过自己阅读宗教经典来认识了这一宗教，认可了它所宣扬的宗教理念。此外，新兴宗教所发展的信徒往往多数是青年人或教育背景、教育程度较好的人，他们更渴望从阅读经典中体会宗教教义。据调查发现，现今中国巴哈伊信徒年龄：涵盖所有年龄段，但大多数人在 20 ~ 40 岁这个年龄段；教育水平：大多数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少部分在国外的大学深造过，很多人的英语都比较流利。从信徒的特点来看，在中国大部分巴哈伊信徒是高等学历的年轻人群，他们愿意自己阅读原典著作。然而，巴哈伊的资料多数是波斯文、阿拉伯文，一些被翻译成英文，中文资料只是近年来才出版了一些。但对于一个欲在中国土壤中生存立足的新兴宗教而言，这些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原典著作阅读的需要，因此对巴哈伊教经典的中文翻译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巴哈伊教经典翻译过程中，有以下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巴哈伊教经典，包括被翻译成英文的原著（巴哈伊教称为天启），其语言或内容晦涩难懂，一般不是出于信仰的角度考虑，很少有人对这样的经典感兴趣。多数资料在巴哈伊世界文献中心长期存放着，无人问津。目前，从事这些经典翻译的工作多数是出于宗教的发展而由巴哈伊社团专门组织或巴哈伊信徒来承担的。因此，这就需要经典的译者客观、公正，不能带有主观情感，否则会改变原始经典的内容或意思。值得庆幸的是，2010 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巴哈伊文献研究中心，正在着手翻译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原始经典，将来会有更多的中文巴哈伊文献问世。其次，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的过程。在巴哈伊教早期阶段，巴布运动失败后，巴比教分裂成两个对立的派别即阿扎利派和巴哈派，从而造成对早期巴布教事件的描述等给予了两个对抗的神学解释。我们在资料查阅及翻译过程中发现，同样是从波斯文或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的著作，两派的翻译却有很大的差异或分歧。因此翻译人员或研究者需要认真考虑历史资源的可靠性。

一个真正的经典翻译者不仅要精通语言，而且还有深谙中国文化底蕴和巴哈伊教的历史文化背景。因为宗教经典的翻译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翻译，既要力求内容忠实于原文，语言流畅、有美感（即我们常说的信、达、雅），还要承担着一种使命和重大的责任，从传播学的视角考虑巴哈伊教宗教经典翻译要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等问题。